

• 特稿 •

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朱安东 王 娜

内容提要: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由于金融垄断资本的支持, 新自由主义不是被抛弃, 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残酷的阶段。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发展, 经济陷入困境, 政治和文化的危机也在不断深化, 世界资本主义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制度性的系统性危机当中。我国应当对世界资本主义可能发生的变局有所准备, 同时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的困境 垄断金融资本

中图分类号: F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17) 04-0001-09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 9 年, 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尚未从危机阴影中走出来, 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相反, 西方的经济、社会危机在不断深化, 各种在 10 年以前还难以想象的事件在不断发生, 例如,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英国公投脱离欧盟, 特雷莎·梅所在的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输掉了对议会的多数控制, 而西方主流精英对此既无法理解, 更难以提出解决方案。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世界资本主义正在陷入一个系统性的危机之中。这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本该被抛弃的新自由主义仍然主导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密不可分的, 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

新自由主义无疑是近几十年来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 这个思潮的主体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即经过各种数学和模型包装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 又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它宣称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 不受干预的市场可以引导着自利的个人最终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最优化, 比如市场的稳定均衡状态。其政策主张一般被简称为“三化”, 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虽然自从这个理论诞生以来, 不断有学者在指出其理论谬误, 现实也一再验证其错误, 但由于它符合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 新自由主义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了主流的意识形态, 而且被强制推行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 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作者简介: 朱安东,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王娜,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与我国的应对方略研究”(项目编号: 12&ZD091)。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向世人清楚地表明了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引发了各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例如,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祸首(Kevin 2009),著名金融大鳄索罗斯认为金融危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作用的结果(于祖尧 201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近30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吴易风、王晗霞 2009)。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以为这一轮金融危机会敲响新自由主义的丧钟,将导致新自由主义的失势。然而,近十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却仍然主导着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学教育。

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之所以仍无法真正撼动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是因为在危机之前金融垄断资本已经“捕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控制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垄断资本让各国政府以救市为名,用大量的公共资金挽救了自己,使其避免了应有的损失和打击,保存了力量。直接导致本轮危机的金融资本家们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其力量反而在危机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他们仍然牢牢掌握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因此,作为反映他们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非但没有被抛弃,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更加直接打压中低收入阶层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阶段。有学者把它称之为“惩罚性”(punitive)新自由主义阶段(Davies 2016),也有学者称之为“新自由主义3.0版”(Sidaway & Hendrikse 2016)。

二、新自由主义在新阶段的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却总是要服从垄断资本的利益。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打击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放松对资本的管制等方面是行了新自由主义之实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出口以及重要企业的并购等方面所做的却是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相矛盾的。

(一) 富人的“社会主义”与穷人的“资本主义”

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并未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等待市场自动调节回到所谓的均衡状态,而是迅速采用了高强度的传统和非传统的政策救市,动用了大量财政资金挽救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垄断资本。如美国政府将房利美和房地美、AIG国有化,并推出7000亿美元的紧急救市计划。这一系列措施导致政府的公共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其中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65.5%上升到2015年的114%,日本由162.4%上升到229.9%,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这一比重平均由74%上升到115%(OECD 2016)。

随着这些国家国债水平的迅速攀升,特别是欧债危机的爆发,许多国家纷纷以此为借口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财政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支出,使得中低收入群体再一次成为了主要的利益受损者。

这种在危机期间用大量公共资金挽救那些导致了危机的富人,却在中低收入阶层最

需要社会福利的时候削减社会福利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和各种社会抗争。有学者指出,除了把它看作是某种(阶级)报复之外,难以找到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Davies, 2016)。

(二) 工会力量继续被打压

与危机前一样,政府继续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并进一步打压工会组织,其结果是工会成员率进一步下降。根据经合组织提供的数据,除了比利时等极少数国家外,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工会成员率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都是下降的,并在危机之后进一步下降。由表1可见,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工会成员率在1978年之前总体稳定并略有上升,但此后开始下降,到2007年下降到了18.1%,危机之后进一步下降,2014年下降到了16.7%。

表1: 部分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工会成员率: 1960 ~ 2013 年

年份	澳大利亚	法国	德国	日本	瑞典	瑞士	英国	美国	OECD 平均
1960	50.2	19.6	34.7	32.3	72.1	31	40.4	30.9	34.7
1978	49.7	20.5	35.5	32.6	77	28.3	50.2	23.9	35.2
2007	18.5	7.5	19.9	18.3	70.8	18.5	28.1	11.6	18.1
2014	15.5	7.7*	18.1*	17.6	67.3	15.7	25.1	10.7	16.7

* 法国和德国最近的数据是2013年。

数据来源: OECD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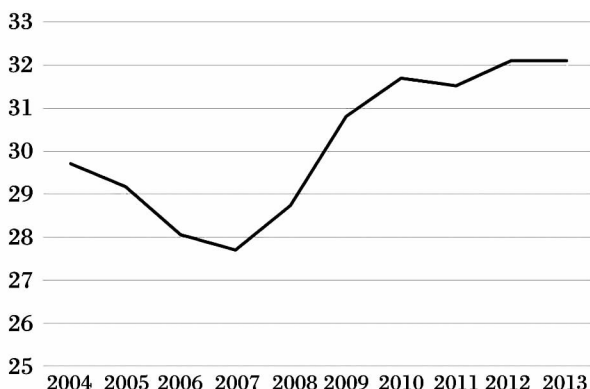
工会成员率的下降意味着工人组织性的降低,再加上金融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的处境更加困难。对此,沃尔夫冈·施特雷克曾指出,金融危机后,经合组织国家总体保持较高的失业率,即使像瑞典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一段时间达到8%左右的峰值(Sreeck 2016)。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就业已经恢复的国家,工人也会由于技术变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等因素只能得到更低的工资并处于更恶劣的条件。例如降低工人的有效工资,在增强雇主权力的同时去工会化等。

(三) 贫富分化和贫困问题加剧

工人力量的进一步被削弱、工人工资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以及社会福利缩减等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后 OECD 国家贫富分化和贫困问题加剧。根据经合组织提供的数据,在有可比数据的34个国家中,有19个国家2014年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高于其2007年的水平。OECD 国家最低收入的10%人口,其收入份额占比仅为2.7%,而最富有的10%人口,其收入份额占比则为24.7%,两者相差9倍多(OECD 2016)。与此同时,许多国家贫困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并高居不下(见图1)。这些国家的平均贫困率从2007年的27.7%上升到了2013年的32.1%。到2015年,美国的贫困人口达4310万,贫困率为13.5%,比2007年高1个百分点(U. S. Census Bureau 2015)。

(四) 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共存

这种“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齐昊、李钟瑾, 2012)。即使不考虑民众所遭受的困苦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反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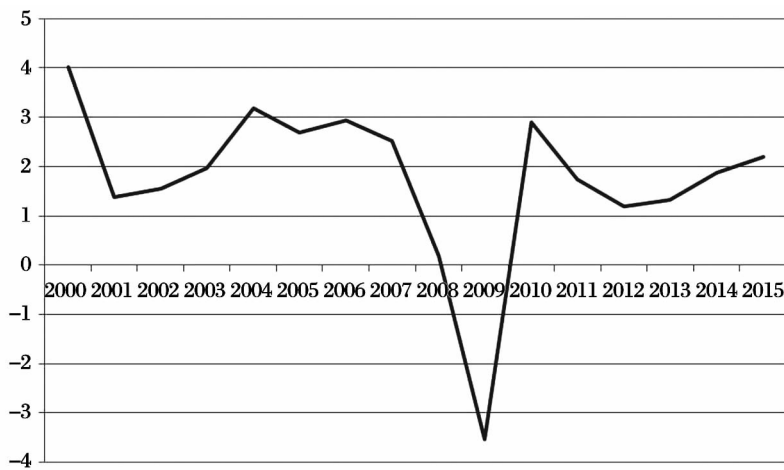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OECD 数据库。

图 1: 部分 OECD 国家平均贫困率(%) : 2004 ~ 2013 年

部分国家包括: 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英国、立陶宛, 数据为未加权平均。

由于上述新自由主义政策, 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 甚至有长期停滞的危险(见图 2)。在危机后的八年(2008 ~ 2015 年)中, 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 GDP 增长率只有 2010 年和 2015 年两年超过 2%, 其余年份均在 2% 以下。面对这种情况,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一批经济学家都警告西方国家经济有陷入长期衰退的危险。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图 2: OECD 国家 GDP 增长率(%) : 2000 ~ 2015 年

金融危机爆发后, 西方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 另一方面迅速降低利率, 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欧元区都把基准利率降到了接近于 0 的水平。在这些政策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形下, 欧元区、日本、瑞士、丹麦等区域和国家甚至推出了负利率政策。大量廉价资金充斥市

场,除了一部分成为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外,大量资金进入了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部分西方国家已经又开始出现了房地产泡沫,更为严重的是相当一批西方国家的股票指数屡创新高,市场泡沫甚至超过了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以美国为例,其标准普尔 500 指数所包含的企业的长期实际市盈率曾在上一轮危机之前的 2007 年 5 月达到峰值 27.55,而在 2017 年 4 月进一步攀升到 29.19^①。

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一样,今天这种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同时存在的局面也给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如果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泡沫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泡沫破裂之后所带来的后果会更加严重;如果采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泡沫则可能破裂,经济有可能很快陷入衰退。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后的两难困境也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严重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在上轮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倒行逆施不仅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还给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严重挑战,使其陷入系统性的危机之中。

(一) 经济危机可能即将到来

我们已经看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迫切需要走出经济停滞,回到强劲且可持续的增长中。但是,西方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已陷入困境。对于财政政策而言,过高的公共债务已经使财政政策发挥的空间非常有限。对于货币政策而言,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所累积的金融泡沫也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国际清算银行指出,“各国中央银行无法制定政府和公众期望之中的、使经济回到真实增长路径上来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中央银行的政策是在为经济复苏争取时间……但是时间并未被很好地利用,因为持续的低利率和非常规的政策使私有部门很容易推延去杠杆化的过程,使政府很容易为赤字融资,使中央银行很容易拖延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需的改革。毕竟,廉价货币使借贷比储蓄更容易,支出比收税更容易,原地不动比改革更容易”^②。

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西方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面对各种经济问题时的无能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今天,在货币扩张和财政紧缩同时发生的这个阶段,数百万公民的福利,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都依赖于中央银行行政人员、国际组织和各种部长理事会的决定。他们在一个远离日常经验并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神秘空间指挥,处理的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内部人也不能确定他们要做什么以及他们已经做了什么”(Sreeck 2016)。考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以及上一轮危机爆发迄今已近十年,再考虑到严重的金融泡沫等因素,不出意外的话,下一轮金融和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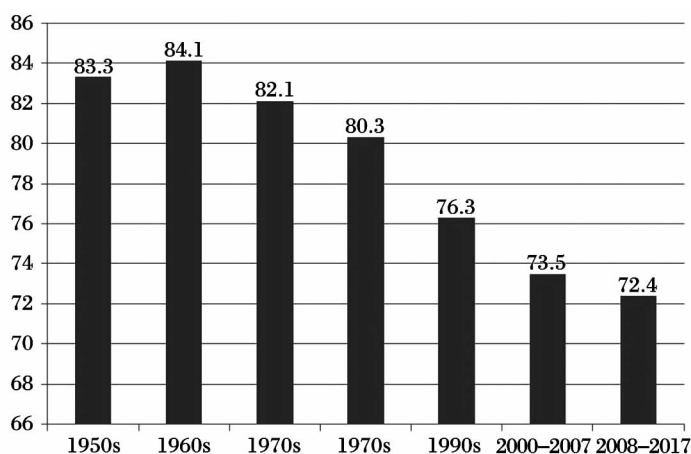
(二) 正在深化的政治危机

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继续推行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开始爆发。长期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资本主义阶级矛盾调和的工具。

① 数据来自 Robert J. Shiller 教授个人网站(http://www.econ.yale.edu/~shiller/data/ie_data.xls)。

②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83rd Annual Report, 2012–2013.

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资矛盾不可避免,但是因为民众手中握有选票,政客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为了讨好选民而提出一些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施政纲领。但是,当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后,金融垄断资本力量逐渐壮大,工人力量被不断打压,资产阶级的敌人似乎已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西方政治民主普遍感到失望,政治参与的热情不断下降。在20世纪50~60年代之间,西方国家大众的平均投票率都普遍上升。然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后,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不断下滑,2000~2007年平均投票率已经下降到73.5%。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投票率进一步下滑到72.4%(见图3)。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也在2008年之后显著下滑,2016年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仅为68.30%。选举率的显著降低正说明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意识到选举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意义是有限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数据来源: <http://www.idea.int/vt>。

图3: 西方国家平均议会选举投票率(%) ,1950~2011年

说明: 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新西兰、挪威、波兰、西班牙、瑞士、英国、美国、荷兰和瑞士。

还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选举中政治极化的现象日益凸显。在正常时期,大部分选民总是愿意选那些主流的候选人。但是,最近几十年的经验让他们认识到,无论是中左的还是中右的候选人,上台后执行的都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历史让大多数选民认识到,主流的候选人上任以后无法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也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那些非主流的,即在西方政治光谱中所谓的极左或者极右的候选人。2012年,日本极右翼政治人物安倍晋三当选首相;2015年,希腊极左翼政治人物齐普拉斯当选总理;2016年,美国右翼极端主义候选人特朗普当选总统。不断出现的政治黑天鹅事件恰恰正说明民众期待着大的变革。但到目前为止,由于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没有出现重大变化,金融垄断资本仍然掌控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无论什么人物当选,在西方国家都很难彻底逆转新自由主义政策。

(三) 不断发展的文化危机

长期以来,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但是,西方国家投票率的不断

降低及民众选举结果的极化,恰恰反映出大众对西方民主越来越普遍的质疑。

自由竞争的市场既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由理念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恰恰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2009)所以,经济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出于资本积累和扩大世界市场的需要,必然是要求资本的全球化,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然而,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贸易遭到强烈的质疑与抨击,各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与之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次部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中开始出现了强劲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声音。欧洲一体化曾是地区一体化的旗帜和典范,“英国脱欧”使欧洲一体化遭遇重大挫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行政措施就是退出象征自由贸易的TPP,甚至意欲终止1994年就签署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重新谈判。这意味着西方社会深度质疑长期以来所宣扬的自由竞争理念。

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主流精英在内的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幻灭。在西方国家,由于自由主义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经济政策和社会问题束手无策,更无力解决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以及难民等问题,在社会各个群体中都开始出现了质疑自由主义的思潮。人们发现,西方的主流理论无法解释当今世界的变化和发展,也找不到解决当今世界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原因,更提不出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思想界弥漫着困顿与焦灼的气氛,透露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重的信心危机。有评论家将2014年称作‘震惊之年’(a year of shocks):这并不是来自特定困境与混乱的冲击,而是因为‘以往用以控制这些混乱的力量与原则的结构不复存在’。秩序结构的丧失带来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瓦解感’,这才是最令人震撼的。”(刘擎,2015)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不顾及政治正确的特朗普才能当选美国总统,而其当选这个事件是西方许多主流精英至今难以接受的。这本身恐怕也是西方文化危机的一个表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2009)

未来,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将面临系统性制度危机的总爆发。

四、总结与反思

面对新自由主义给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制度体系带来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又一次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的未来问题。

历史上,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桑巴特、凯恩斯、希法亭、波兰尼和熊彼特等许多学者都曾预言过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将看到资本主义的终结。在不同的时间及在不同学者的理

论框架中,什么样的危机终结了资本主义是不同的。导致资本主义终结的危机理论包括结构主义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或者利润率下降(马克思);或者是市场饱和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凯恩斯);或者是生活和社会进一步商品化的阻力(波兰尼);用于殖民化的新土地和新劳动力的耗尽(卢森堡);技术停滞(康德拉季耶夫);垄断企业的金融政治阻碍自由市场(希法亭);世界各地经销商帮助的创业主义的官僚压制(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等(Sreeck 2016)。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倒行逆施,使我们似乎看到了所有危机理论影子,如全世界的生产过剩而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停滞,金融垄断资本力量的加强,变革性技术的缺乏,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垄断金融资本通过放松甚至取消政府的管制、打击劳动的力量削弱了所有束缚它的敌人。然而,资产阶级也许用新自由主义消灭了资本主义的敌人,但同时也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在工人力量被严重削弱的今天,人们可能难以如马克思一样乐观地将工人视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也可能无法准确判断资本主义什么时候灭亡、如何灭亡、什么样的方式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当资本主义经济持久停滞、民主政治受到挑战、自由价值观受到质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不断积累深化,各种黑天鹅不断出现,最能确定的事情也许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动荡与危机,一个微小的事件可能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内爆。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的发展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并做好应对的准备。

首先,我们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变局要有预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经贸往来的不断增加,我国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201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40%),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有着重要影响。2007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拖累。2007年我国经济政策的取向还是“防过热、防通胀”,当年的GDP增速高达14.2%;但到2008年年末,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我国不得不紧急出台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受发达国家经济停滞的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恶化,外汇储备波动,经济增长下滑。未来,随着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加剧,一旦爆发大危机,我国的经济外部环境可能将更加严峻。对此,我国要提前准备好预案。一方面,我们要尽快采取措施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分化,扩大内需;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要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导下,积极开拓沿线国家市场,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波动对我国所带来的影响尽量减小到最低。

其次,要积极有效地清理和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学教育和个别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且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对此,我国应高度重视并尽快加以解决。应该看到,在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同时通过精准扶贫等有力措施,贫困率不断降低,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我们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反对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新自由主义

的理论错误和实践危害的研究和宣传,在学界和社会上消除新自由主义的不良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结合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使之主导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以及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

参考文献:

- 刘擎 2015 “2014 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15 1。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 《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齐昊、李钟瑾 2012 “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 4。
- 吴易风、王晗霞 2009 “克鲁格曼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 5。
- 于祖尧 2012 “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衰败”,《红旗文稿》2012 24。
- James D. Sidaway and Reijer Hendrikse, 2016. “Neoliberalism Version 3 + .” In Simon Springer, Kean Birch & Julie MacLeavy eds. *The Handbook of Neoliberalism*.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New York & London.
- Kevin Rudd, 2009.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Monthly*. February 4.
- OECD 2016. “Economic Outlook No. 100 – November 2016.”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EO#>.
- “Income Inequality Remains High in the Face of Weak Recovery.” <http://www.oecd.org/social/income-distribution-database.htm>.
- William Davies 2016. “The New Neoliberalism.” *New Left Review* 101. September – October.
- Wolfgang Sreeck 2016.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Brooklyn, New York: Verso.

A New Phase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Systemic Crisis of Capitalism

Zhu Andong¹ & Wang Na²

(1.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2.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ith the support of monopoly – finance capital, neoliberalism was not abandoned, but evolved into a new and more ruthless phase. It leads to the aggravation of the problems of capitalism. With stagnated economies and deepene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rises, world capitalism is exposed to a systemic crisis. China should be prepared to the possible shock of world capitalism and resist neoliberalism.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Capitalism Crisis; Monopoly – Finance Capital

(责任编辑:王燕燕)